



台灣查某電子報

2008 第一期 (Issue 1, 2008)

發刊日期：March, 2008

本期內容

✦ 文化觀察

「我擔心被拒絕，因為我是亞裔……」

✦ 性別議題

女性、家庭、與跨國流動：以台商家庭為例

✦ 2007 冬令營心得感想之一

Taiwan Women in Spectrum 2007

✦ 2007 冬令營心得感想之二

冬令營的成長

✦ 美食世界

留學生廚房

✦ 好書介紹

遠藤周作 「深河」

主編：葛茂豐

「我擔心被拒絕，因為我是亞裔．．．」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心理系博士後研究

廖莘雅

美國過去的十一年間，我常常從台灣留學生那裡聽到在美國找工作如何辛苦等等。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常常會擔心自己大概不會被老闆錄用。除了找工作之外，我們也經歷很多擔心被拒或被忽略的情況，像上課的時候擔心被老師忽視，或是到商店買東西時擔心老闆會用大聲且慢的英文跟我們講話。在各式各樣的情境中，我們的擔心往往跟我們是亞裔或我們不是美國人連結在一起。

由於亞裔在美國社會視為被壓迫的族群，我們很容易會將我們生活中的挫折感歸因到我們的身分。也因為這樣，當我們在面對不確定的情境時，我們往往會將我們的擔心連結到自身是亞裔或國際學生的身分。然而，這種連結到自身身分的敏感度因人而異。根據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Mendoza-Denton 教授近期對非裔學生的研究，過度擔心因為自己族群身分的關係而被拒絕的非裔學生較易在多數白人就讀的學校中產生適應問題。例如，他們較易產生生理和心理的不適應，而且他們在校成績退步等等。在我一份最近針對亞裔學生的研究中也發現，過度將自己被拒的擔心連結到自身族裔身分的亞裔學生較易在多數白人就讀的學校中產生身心不適。

從以上的研究中我們不難發現這種擔憂因自己身份而被拒絕的敏感度往往是我們長期在美國社會中被歧視忽略的結果。過度的擔憂只會帶給我們對自我的不信任，也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之後的表現。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正視這些問題，在擔憂會不會因為自己的身分而被拒之前先想想為何會產生這些擔憂，以及如何去抗拒這些疑慮。

女性、家庭、與跨國流動：以台商家庭為例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李香潔 博士

在跨國研究領域裡，flexibility 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例如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和 flexible accumulation 被用來探討跨國公司的彈性生產模式和相關勞工問題。在一些學者對以下字串組 flexible identity/ethnicity/nationality/citizenship 的不同的排列組合裡，flexibility 詮釋移民的主體性：他們如何在不同的情境底下表現出不同的國家或族群認同，用以保護自己或是取得利益。一些比較新的研究也慢慢地開始注意到國家或政府為了在跨國社會裡生存所發展出來的新彈性策略。相較之下，和女性相關的研究似乎微乎其微。我博士論文其中一個章節便是用台商家庭為例子來探討這個議題。在深度訪問了 30 個家庭和閱讀了歷年來的媒體報導後，就女性與家庭這個主題進行分析。

台商家庭和 Flexibility 這個概念的相關處在於：和台商家庭有關的跨國移動模式有很多種，大部分的台商獨自到大陸打拼，老婆和小孩則留在台灣；有些舉家移民；有些先分開，再舉家移動；有些則是先舉家移民，再回來部分。不管是哪種方式，台商家庭必須根據大陸所給予的經濟利益以及台灣提供的教育和社會資源等等，去評量何種家庭移動模式在何時對於家庭成員的利益最大。Flexibility 指的不只是家庭成員何時能做不同的跨國移動，也是指這樣的跨國移動能帶給家庭最大的資源和彈性。

我的大部分女性受訪者(20 至 40 多歲不等)為了小孩的教育留在台灣。雖然這些女人並不是主要的跨國移動者，先生的跨國移動(spatial relocation)也造成了太太家庭位置的移動和社會角色的轉變(social relocation)。這些女人或者變成假單親家庭，或者加強和婆家或娘家的聯繫以取得小孩照顧上的協助。比較一致的情況是：母親和小孩間的聯結快速加強，父親和小孩間的互動相對減弱。社會的期待進而強化這樣的親子關係：當父親不在時，社會在耽心這些小孩的成長之餘，也對母親寄予更多的責任。相較之下，兩個留守台灣的男性受訪者將小孩交由媽媽照顧，與小孩的互動增加程度似乎沒有女性受訪者來得明顯。

另外，有一些女性受訪者放棄工作和先生同赴大陸，因為有能力雇用中國勞動者負責家務，她們認為自己的階級地位向上提升。但是，她們在中國的空間行動能力被整個台灣移植過去的男性家長制度制約者，原因是台灣圈對中國社會安全制度仍有一定的不信認感，所以台灣男人要付起"保護"女人的角色。這些台灣女性移民到中國後，角色變得單一化--她們或是誰的太太或是誰的媽媽，女性間的聚會也集中在討論相夫教子。

夫主外妻主內在傳統社會裡是個常見的狀態，但我的許多受訪原先是雙薪家庭，也不認同自己為傳統婦女。當家庭面臨是否分隔兩地和如何分隔兩地的抉擇時，主要的考量似乎還是以先生的就業遠景和小孩的教育問題，於是家庭在跨國移動中得到的 flexibility 很少從女性出發。傳統的家庭分工模式似乎藉由必須跨國移動的壓力還魂。雖然在某些案例上太太聲稱：先生不在家，生活較自由，不用每天打掃家裡，變得較獨立等等，這樣頂多只能算是少數女人"順便"從中得利而已。

Taiwan Women in Spectrum 2007

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

梁培琳

From a dot to a line, from a line to an entire network of Taiwanese women, the 2007 Taiwan Women Winter Camp was as fruitful as it was memorable. Serving as a first-time speaker for the camp, the opportunity not only allowed me to share my research on the Shigang Mama Theatre Company, but also to learn from all who attended the four-day camp.

From housewives, teachers, flight attendant, university professors, architect, news reporter, lawyer, psychologist, museum co-ordinator, engineer, artists, social workers, anthropologist to sociologist, the event was a platform where a spectrum of Taiwanese women living in the US gathered and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While some have made the US their home, others are at various stages of transition. Although the attendants came from a diverse background, young, highly educated and extremely mobile were common qualities shared by all these women. From Taiwan to the US, from their respective town of residence to New Jersey, the geographical relocation and shifting of these women are also symbolic of their cultural and emotional transitions and dilemmas. It was also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ir reflections upon these challenges, they gathered to network and to join forces.

It was an honor to introduce to this group of women another group of women residing in the central country of Taiwan. Established in the year 2000 as a result of the gigantic earthquake in 1999, the Shigang Mama Theatre Company is an all-mother theatre company based in a Hakka village in Shigang, Taichung. From telling stories of earthquake survivors to performing stories of themselves as Hakka women, housewives and pear farmers, the Shigang Mama Theatre Company has over the years explored the identities of her members through theatre. Moreover, as a result of their performances, the company members initiated their own Fruit Produce Association and restaurant. During the presentation, both Jen-jen the company leader and Sio-sun the director spoke face to face with the camp attendants through skype.

When I saw how these two very different groups of women exchanged their ideas and experience through state-of-the-ar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t all of a sudden dawned on me how close the local could be to the global. Despite the apparent backgrou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of women, both struggle and fight in their respective worlds as Taiwanese women. From a dot to a line, from a line to a network, and from a network to another network, Taiwanese Women continues to weave networks of support, exchange and safeguard.

冬令營的成長

無名氏

我一直在等待一個機會，等一個機會離開那個怪異的工作場域。

其實，我並不是很清楚「怪異」的原因。

當第一眼看到這次的冬令營的主題「勞動、能動、撼動」時，腦中頓時浮現的是「我的勞動經驗能撼動什麼嗎？曾撼動什麼嗎？」，就這樣我與冬令營有了聯繫。也從眾多講員的分享中，慢慢回顧自己的勞動經驗，細細的思索自己的角色。

事實上，我在台灣有一份人人稱羨的工作，每年有數萬人想盡辦法的要擠進這個窄門。當初的我亦是如此的欣喜萬分。其實我的工作也不是這麼令人厭惡，我還滿喜歡我的工作的（僅限於「正式工作」）。我釐清了問題所在，怪異的是場域（或者說是「undocumented labor」）。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工作場域，我發現長期以來，有股說不出的不愉快一直環繞著。不愉快來自在這個場域中執行 undocumented labor 的被迫性，去完成科層體制中層層巴結醜態，而我可以從中換取讓我樂在其中的正式工作的空間。

這些 undocumented labor 經驗廣泛到難以整理。猶記工作的第一年，恰逢上級來視察，端湯添飯是我被指派的工作，雖然心裡面感覺不對勁，長官一句「辛苦你了」也讓我沒有再想太多，以為這就是職場。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真的不能忽略，漸漸的我視這些事情為理所當然。我竟然完全沒有意識到有個龐大的組織正一步步的消費一個女性（或者說年輕未婚女性）。

某次機關主辦全國性的研討會，大費周章的訂了高級渡假村，我(及全機關的女性)想當然耳的被列在協辦人員的名單中，許多人很羨煞女性員工占著性別之利，得享藉出差之名而行度假之實，但這種想法實在令人作嘔。我以為政府極力倡行的兩性工作平等委員可以幫忙些什麼，不幸的，我得到的回應竟然是「這是長官交代事項，這件事到此為止」。我的掙扎與抗拒並沒有成功。長官交代事項的定義就是 undocumented labor，範圍包括陪吃飯伴夜遊。

如果將這些經驗詮釋成習得無助的過程，讓我建構出這就是所謂的職場的信念，不知道可以應用在多少女性員工的身上！事實上，我很難把「消費」兩字註解在自己身上，但又不得不承認過去我扮演者被消費的角色，被當成升官發財的工具。

反思的過程，並不是很容易，也不一定是愉快的經驗，但是反思後的成長與收穫卻讓我更看清楚自己的存在與未來，珍惜自己目前的環境及所擁有的獨立性與自主性，期許自己未來能像營隊簡介上說的，看見自己掙脫限制、創造空間的勇氣，與撼動體制的無窮可能。

留學生廚房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謝一誼

留學生到異地最快要面臨的挑戰，大概就是吃了。人一天要吃三餐，台灣人又熱衷消夜，習慣了麵線肉圓，熱湯熱麵的我們，一到美國通常都沒辦法接受他們帶個冷三明治，不然就蘋果香蕉果腹的。我在台灣就喜歡吃沙拉啊，三明治的，咖啡也喝得很兇，一群朋友常常笑我是美國人。不過在台灣要自己一個人煮東西的機會也不多，再加上台灣人有群聚吃飯的文化，餐飲業比起甚麼都生氣蓬勃，要不跟朋友吃飯，要不跟家人一到。一個日本女生的朋友，來到紐約已經三年多了，一個快要下雪的傍晚，我坐在她曼哈頓的公寓裡，一個廚房兼客廳，白天還要充當工作室的小空間；她一邊煮印度奶茶，剪開一整顆乾茴香丟進滾燙的奶水，一邊敘敘說著怎麼習慣一個人的生活。她說第一年最大的震撼就是領悟到要自己一個人吃飯。她講的像是別人的事，我倒是眼睛一陣熱起來。

我到紐約開始一個人生活，也熱衷起各種菜單甜點。一方面在紐約生活，要省點錢就非自己煮不可。學校裡的一群外國學生朋友，去年底開始定期在不同朋友家聚餐，餐桌上可以同時出現蘇俄醃蘆筍、醃芒果(這個真的大開眼界)，伊朗炸肉餅，德國波菜鮭魚干層麵，哥倫比亞椰子飯。通常大家待到半夜又餓了，居然有人可以馬上揉起麵糰烤麵包！我最近喜歡用美國的葡萄柚入菜，做了幾次的葡萄柚煎奶油鮭魚，整個用葡萄柚和香吉士下去，稍帶肥花的鮭魚，兩面都裹滿迷迭香，用奶油煎。表面煎到金黃後，把新鮮的葡萄柚擠出的果汁，帶著果肉倒進鮭魚裡繼續煎，假使買新鮮一點的鮭魚，裡面有點六分熟都還很好吃。迷迭香省胃，酸甜的香氣混和奶油，還有鮭魚本身的軟嫩，吃得一群人大呼叫好。這道菜也蠻適合自己一個人當晚餐，配上圓麵包，一杯茶或是白酒，打打牙祭。

在美國還學到一道快速又好吃的早餐，煎炒馬鈴薯。選紅色的小馬鈴薯，切小塊，不規則三角八角都沒關係。煎完培根的油鍋，直接把切了小塊的帶皮馬鈴薯，丟下去煎，假使嫌味道不夠，還可以稍微混一點奶油，通常我還會加一點迷迭香提味。有時候家裡有那種速食杯湯包，南瓜湯或是玉米湯的，混一點熱水，調成濃稠醬汁，混進已經煎到金黃的馬鈴薯，煎到醬汁收乾，就又是另一道菜。

留學生要一個人生活不容易，我揣想大部分時間裡，都是一邊趕著作業，滿桌是書，擠著電腦就泡麵充飢了。這大概也是為甚麼留學生常聽到誰又搞的筆記型電腦浸水，要花大筆錢送修麻煩一堆！有時候幸運的能空一個傍晚，自己在廚房弄東弄西，才覺得真的吃了一餐像樣的飯。今年印象最深刻的一頓飯，是農曆除夕，我跟室友，兩個女生一邊煮著火鍋，滿桌的螃蟹豆腐魚餃蝦餃，一邊還啃著書，沾了沙茶醬的白菜都滴到書頁裡。

我是不喜歡很應酬的飯局，在台灣就不喜歡，不過能夠跟一群朋友煮阿吃的，抱怨壓力學校男朋友女朋友，生活也才像是生活，人比較能有個人的樣子。喜怒哀樂！

遠藤周作 「深河」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葛茂豐

閱讀小說，我最先期待的是「重量」。

所謂「重量」，是一種意念產生的境界。讓深沉哀傷的氛圍，像龐然魔魅般悄然落下，讓一行一句間被壓在巨石下的奄奄氣息，劃分開思考和生命本身。讓閱讀時的思緒意念流轉在每一個深沉的年代裡，每一片哀傷的土地上，直到再也承受不住而抽身離開為止。

遠藤周作的「深河」帶給我的正是如此這般的境界。

從故事面來看，所謂深河，指的是印度的恆河，代表上蒼無止盡的愛與憐憫，接納世間萬物。書中主角是一位虔誠的日本天主教徒，在歷經考驗與責難而成為神父之後，並沒有服務天主教徒，卻在印度為窮苦瀕死的異教徒，引領他們前往永生之地，安眠於包容一切悲哀的深河裡。遠藤周作在故事中靜述主角宗教觀念的轉變，也就是在一神論信仰下對轉世觀念與泛神論信仰的認同，其間的思索與心路歷程。書中遠藤周作藉由主角說出：「神擁有各種臉。我認為神不只是在歐洲的教會、小禮拜堂，神也在猶太教徒、佛教信徒、印度教信徒之中。」

如果更深一層進到文化面來解析，西方因宗教而形成其文明中核心觀念之一的「原罪」，在東方文明中並未能找到相對應的概念。而本身為天主教徒的遠藤周作不斷在他的作品中，探討日本人對罪的態度和看法。(這裡的罪非指法律上的罪，而是宗教上對神的無視所產生的罪。) 如果回歸到傳統日本文化下來看，其特有的「恥」感，塑成無形的制約力量，個人意見被團體行為所壓制，在恥意識大於罪意識的環境下，個人的自省能力也就更加薄弱。

援引哲學概念來說，二律背反(antinomy)是康德重要的哲學概念之一，主要是說針對同一問題的兩派理論，邏輯上各自成立卻又彼此相互矛盾。以此概念來看待文學與宗教，兩者皆意圖藉由語言文字來揭示生命中不同面向的存在意義，然而兩者的結構和特質卻是大相逕庭。因此在兩者交疊下，「宗教裡的文學」或是「文學裡的宗教」，就成為詭譎奇趣又難以掌握的題材。「深河」便是企圖在這樣的架構下，闡釋遠藤周作內心，意欲突破宗教的狹窄範疇，追尋足堪豐盈生命意義和人生價值的巨大與永恆。

然而，這樣的解釋仍是意猶未盡，彷彿只是遠方悠悠的歌聲，遙遙以輕颺。

在思維的深湛厚實中，答案與問題依舊持續糾纏綰結著。